

四十三年来的坚守

方洪羽



一

一走进黎仕伦的办公室，我就被玻璃展柜里一大摞鲜红的奖状、荣誉证书和金色奖牌所吸引。“先进个人”“优秀放映员”“全省农村电影放映先进集体”……在这些荣誉背后，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四十三年来的乡村电影放映之路。随行的县里同志告诉我，不管是在黔北余庆县哪个乡村，只要说起放电影的“老黎”，没有人不知道。

二

1978年，神州大地吹起改革开放的春风。这一年，十八岁的黎仕伦第一次扛起放映机，跋涉在余庆县的村村寨寨，开启了乡村电影放映员的人生之路。

每支乡村电影放映队就两三个人，而放映机、音箱、发电机和电影胶片等设备有三百来斤，要经过崎岖、陡峭的山路，运送到散布在大山深处的各个放映点，对当时体重不足九十斤的黎仕伦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挑战。但在压力和困难面前，他并没有退缩。“在乡村放电影是个艰辛的体力活，对我的成长也是很好的磨炼。”这是黎仕伦从事乡村电影放映的心得感受。

尤其是夏天，他和同事们每人手提肩扛百余斤沉甸甸的放映器材，顶着火辣辣的太阳一路翻山越岭，到了放映点，人累得几乎要虚脱。最怕的是半路上突遇暴雨，既担心放映机进水，机器受损，又害怕路上耽搁时间，让乡亲们久等。

在改革开放初期，黔北农村文化娱乐活动形式单一，通常只在春节期间才有老百姓自编自演的花灯、狮子灯表演。所以，电影下乡放映更加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黎仕伦至今记得，他放映的第一场电影是在当时的散溪区龙家公社小坝，放了两部片子：《红岩》和《地道战》。为了来看电影，有的乡亲走了十多里山路。坝子里人山人海，连场坝外的墙头上、树上都有人。当他按下开关按钮，放映机就“喀喀喀”旋转起来，一束光一瞬间投射出去，白色的幕布顿时出现一颗闪闪发光的五角星。随着音箱里震撼的音乐声响起，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呈现出来。人群中猛然发出阵阵欢呼声，随即又渐渐安静了下来，电影精彩的情节让大家都沉浸其中……

直到电影放完了，还有很多观众不肯离去。时隔多年，这一幕依旧深深印在黎仕伦的脑海里。

1995年，随着电视、家庭影院的普及，电影市场遇到一些困难。余庆县城仅有两万多人人口，余庆县电影院亏损严重，陷入困境。因此，余庆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大部分职工都选择了离开。

“仕伦啊，电影都没人看了，你还折腾个啥呀？还是去找点别的事做吧，就算做个小生意也比放电影强啊！”亲朋好友纷纷劝他。

对于别人的规劝，黎仕伦总是礼貌地笑一笑，然后一转身，又去倒腾那台相伴近二十年的放映机和那一盒盒的胶片去了。

黎仕伦做事勤勤恳恳，父亲一直看在眼里。有一天，他对黎仕伦说：“仕伦，你做事踏实，有没有想过争取入党？”其实，黎仕伦早有这样的想法，这次在父亲的启发下，他立刻主动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1998年1月，黎仕伦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家中继父亲之后的第二名共产党员。

入党后的黎仕伦，工作更加努力。后来，组织派人找他谈话：“仕伦同志，电影公司目前的困难你是知道的，组织上要找一个有担当、能做事的人把担子挑起来，想推荐你来主持电影公司的工作……”

黎仕伦很清楚，那时候的电影公司已经是“烫手山芋”，但他想，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组织上安排的工作，再苦再难也要干下来！

他接任余庆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时，公司的账户几乎没钱了，不仅欠着外面一大笔钱，还欠着职工三个月的工资。但黎仕伦相信，只要找对路子，肯花力气，面前的这道坎，一定能跨过去。

这时候，黎仕伦的妻子徐兰平给了他大力支持。她把家里仅有的存款全部拿出来交给黎仕伦，而黎仕伦则用这些资金购买了一些新影片。他一边下乡义务为老百姓放电影，一边带领公司二十多名职工利用电影院的几间闲置房，注册了儿童游乐园、幼儿园等，开始尝试多种经营模式。在黎仕伦的

带领下，全公司齐心协力，扭转了电影院和乡村电影放映队面临关门、解散的被动局面。2002年，余庆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首次荣获“全省农村电影放映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长年在农村奔走，黎仕伦了解村民的需求。余庆县是个典型的农业县，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烟草和蔬菜就是该县的主要经济作物。但很多村民不懂科学种植，靠务农只能勉强温饱。为了帮助乡亲们增收，黎仕伦大量购买烟草和蔬菜种植等科教片下乡放映，还配套制作了《蔬菜种植技术》等手册免费发放给种植户，尽力帮助他们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三

后来，基层电影放映面临更大挑战，黎仕伦辞去电影公司经理职务，专职当起了乡村电影放映员。

徐兰平知道后，埋怨丈夫“傻”。是的，黎仕伦确实“傻”。虽然农村公益性电影放映每场都有一定补贴，但余庆县的各个山村都很偏远，除去租车费、搬运费、人工工资等开支，所剩无几。

后来，最后一个“放映搭档”也离开他了。徐兰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下决心再帮丈夫一把。

“什么？你要和我下乡去放电影？”黎仕伦十分惊讶。

就这样，手脚麻利的徐兰平成为丈夫放映工作的好帮手。

上手之后，徐兰平终于明白丈夫为什么一直舍不得离开他的事业了——吃苦耐劳又具有亲和力，黎仕伦很受乡亲们欢迎，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欢声笑语。

这一年，黎仕伦正式成立了“余庆夫妻农村电影队”。为了让村民看上更好的电影，夫妻二人省吃俭用，花了两万多元买了一台数字电影放映机。数字电影放映机实现了无胶片放映，下乡放映更方便了许多。“余庆夫妻农村电影队”一头扎进大山，奔忙在余庆各个乡村电影放映点。他们带着简单的洗漱用品和一张被子，走到哪

里就住到哪里。

一路走来，有欣慰，也有辛酸。2008年初冬，黎仕伦和妻子租了一辆面包车去白泥镇新寨村放映电影，结果路途中下起暴雨，道路塌方，交通中断。好不容易等到雨停了，车辆却过不去，夫妻二人只能将放映设备搬下车，把矿灯戴在头上照明，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将设备抬到放映点。等把两部电影放完，已经是深夜11点多钟。

当时，恰逢大龙村有村民办喜事，黎仕伦事先已经答应要去放映庆贺。此时夜已深沉，黎仕伦决定，无论大龙村的村民看不看，他都不能失信，于是又从新寨村赶到大龙村。令他没想到的是，村民们竟然都还坐在院坝里等着他。见黎仕伦来了，大家高兴地欢呼着：“要放电影咯，要放电影咯！”黎仕伦心头顿时一暖，眼泪差点掉了下来。

那一次，放完电影，已是凌晨4点多。

四

大龙村每个月至少会迎来一次电影放映。大龙村距县城十七公里，是白泥镇的一个大村，也是一个传统古村落。如今，路修好了，黎仕伦驾着车从余庆县城出发，约莫半个小时就能到达村委会放映点。初夏的大龙村，到处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路边的蔬菜基地、花椒基地一片连着一片，满目苍翠。鸟儿的鸣叫声在山野里回荡，让人听了心生欢喜。

2021年6月15日，正是大龙村放映电影的日子。太阳还没下山，黎仕伦就将幕布挂好了。除了电影，他还特意安排了两部科教片《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常识》与《怎样应对崩塌滑坡泥石流》。

一首经典红歌《唱支山歌给党听》在村子里响起时，村民周其伦知道今天又要放电影了，于是他赶紧来到放映点。

五十岁的周其伦，曾是大龙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2014年年初，周其伦贷款搞养殖。然而，由于他不懂技术，不到两个月，资金全部

打了水漂，负债累累的他，望着空空的圈舍，只有叹息和流泪。

2014年3月，黎仕伦找到大龙村党支部书记商量，要为村民特意安排几场“脱贫致富”专题电影——蔬菜种植科教片。他的想法得到村里的大力支持。正是这几场“脱贫致富”专题电影，让周其伦大受启发，他决定有样学样，把闲置荒废的土地利用起来种植蔬菜。黎仕伦不仅带来各种科教片，还时常来“指点迷津”，有时甚至直接联系县农业部门的技术人员，到村子里免费为大家培训指导。

2016年，周其伦顺利脱贫摘帽。“秋冬两季，我种的白菜、萝卜、葱蒜收入就有六千多元，辣椒收入五千多元，再加上其他收入，总收入不少于两万元。”周其伦给自己算了一笔账后，笑了：“现在脱贫致富了，这得感谢老黎和他的电影！”周其伦的故事不是个例。在科技兴农的路上，乡村电影对推动农村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2021年8月，大龙村发展蔬菜基地两千亩，花椒产业基地三千亩，高规格的清水养鱼一百余亩，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余庆县构皮滩镇红飞村苦水组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山村，大部分是留守老人、妇女和孩子，全组长年在家的不足五十人，而黎仕伦仍旧坚持每月给他们送上一场电影。村民方洪江感动地说：“为了我们这几个人，老黎一直坚持来为我们放电影。对于我们这样的山区来说，看电影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文化艺术的熏陶，十分有意义。”

群众的期盼让黎仕伦感到责任在肩：“哪怕只有一个观众，我也要坚持放下去！”在他心中，能够给村民放电影，能为村子带去欢声笑语，带去热闹，是一件幸福的事。

五

2021年，余庆县农村数字电影放映队荣获“全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这是黎仕伦这辈子最引以为傲的荣誉。四十三年来的坚守，放了近四万场电影，四百多万的观影人次……黎仕伦已从青丝缕缕的“小黎”，变成两鬓斑白的“老黎”。四十三年来，无论山高水远，无论严寒酷暑，老黎都坚持把党的声音、文化滋养、科技知识等，通过电影带到每一个山村，传递给每一位村民。

今年农历二月，老黎已满六十一岁。但他大部分的时间，仍然奔赴在余庆的各个乡村放映点。当他问他坚持到今天的原因、准备什么时候退休时，他笑着对我说：“老百姓所需要的，就是我们共产党员所坚持的！只要我还干得动，就会一直干下去，干一辈子！”

图为余庆县美丽乡村晨景。

王远平摄



从「沙漠之城」到「森林之城」

李光泽

多少年来，陕西榆林的老城南门口一直矗立着一组巨大的骆驼石雕。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榆林开发区大道上又多了一组朱红色的铁艺写意骆驼。榆林跟骆驼有着深远的渊源，还有一个别名叫做“沙漠之城”。榆林跟骆驼有着深远的渊源，还有一个别名叫做“沙漠之城”。我每次看到榆林城中的这些“骆驼”，眼前就会浮现出沙漠中的骆驼，耳边就会响起遥远的驼铃声。

榆林曾经饱受风沙之苦。陕北说书《刮大风》说道：“榆林一年刮一风，一风从春刮到冬。刮得大山没顶顶，刮得小树没影影……”据说在以前，榆林风卷黄沙，遮天蔽日，有时候一觉醒来，家门口就被黄沙封住了。

记得1987年国庆假期，我去榆林农校看望初中同学，那是我第一次去榆林。榆林农校位于西沙。榆林人所说的西沙，泛指榆林城西的一大片区域，因为到处是沙圪梁而得名。在我的印象中，榆林农校西南边的沙圪梁是一望无际的，稀稀疏疏长着一些沙蒿，在晚风中一抖一抖的，在残阳映照下显得有点荒凉。

两年以后，我又去榆林，到榆林师专看望在那里进修的初中班主任。当年的榆林师专在沙漠的包围之中，校园内砖铺的小路上，落着一层厚厚的被风吹来的沙子。

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有一次，我去榆林参加当地组织的文学颁奖活动，所住酒店的水磨石阳台上到处都是沙子。我一不小心，还在阳台上结实实摔了一跤。

虽然为风沙所苦，可是榆林人不肯向风沙低头。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牛玉琴、石光银、张应龙和“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为代表的榆林人，硬是把流沙一亩一亩变成了绿洲，让榆林的大小广场、公园、单位大院和居民小区等所有可以栽树种草的地方，逐渐染上了绿色。今天的榆林已经大变样，并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不久前，我遇到一位来榆林采风的外地作家，他激动地说：“我从南方来，本来想看看沙漠的，但我失望了，毛乌素沙漠看不到了，榆林没有沙漠了。我看到了榆林的生态美，这里的每一棵树都长得很辛苦，但它们竟然长成了森林！”

榆林不断刷新着人们对它的认知。三十年前，我在西安上学的时候，提到榆林，同学们一脸茫然；而现在，去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大城市出差，提起榆林，大家的印象早已改观。如今站在榆林的土地上，脚下不是“乌金”煤炭，就是“白金”岩盐，不是“流动的金子”石油，就是“悬浮的金子”天然气。现在的榆林，已成为“西气东输”的源头、“西煤东运”的腹地 and “西电东

送”的枢纽。

作为一名农家子弟，在榆林安家一直是我的梦想。1993年夏天，我毕业后怀揣省里一位老作家的推荐信来到榆林，找到有关单位，想要调到榆林工作，但未能如愿。在县里工作期间，每次去榆林出差、开会，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因为家不在榆林，总觉得自己只是一名匆匆过客。直到2016年秋天，我终于在榆林安了家，算是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夙愿。

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在榆林高新区朝阳桥北边的一块绿地上，独自度过了一个悠然自得的下午。熟悉的毛头柳和叫不上名字的景观树郁郁葱葱，美人蕉、金光菊、大丽花和秋葵花像商量好一样，一起怒放着。公园里的音响播放着悠扬的萨克斯乐曲，人们或拖儿带女，或扶老携幼，或呼朋引伴，或独自在花间小路上漫步……其实，像这样的绿地，榆林城里还有很多，而且是连成一片的。榆溪河流经榆林城北的红石峡公园，一路向南，穿城而过，河东一里地、河西一里地范围之内，今天全部变成了绿地。有花草，有树木，有流水，形成一条长十余公里的生态长廊。有的榆林人把这条生态长廊叫做水岸公园。拥有这样一个充满诗意的水岸公园，无疑是榆林人的福气。

从“沙漠之城”到“森林之城”，这些年，我亲眼见证了榆林的可喜变化，更是从心底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



图为榆林城市风光。影像中国

大地

朋友来磐安，问我哪里值得看一看。我毫不犹豫把他领到了江南药镇。

一下车，朋友就被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中药特色小镇给吸引住了。鳞次栉比的中药商铺，熙来攘往的各地客商，人声鼎沸的热闹场景，令这座长三角知名的中药材集散地溢满了喜悦与憧憬。看着朋友饶有兴致地问性味、问品质、问价格，大包小包买个不停，我内心生出一丝骄傲：伴随时代发展步伐崛起的江南药镇，让世代种药的磐安药农，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市场经济发展的红利了。

作为土生土长的浙江磐安人，我对家乡最早的记忆就是穷和苦。小时候家里穷，缺医少药，父母会采点土草药洗净、晒干、储藏备用。鱼腥草、菖蒲、金银花、薄

荷、野菊花、葛根等，常见的小毛病都有药可治可防。药是草，草也是药，磐安的乡间村民大多是有着采药、种药知识的药农，他们将山上移植的、祖辈留传的白术、元胡、贝母、元参、芍药等品种，就近种植在田间地头，渐渐发展成为磐安的一大特色。

相传，南梁昭明太子萧统曾隐居磐安大盘山，在此结庐读书，还教民种药。自唐朝开始，山民就在大盘山上修建昭明院，以志纪念。如今，大盘山已成为一座以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为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内拥有野生药用植物一千零九十二种，占浙江省药用植物的百分之六十一，天冬、龙胆、短萼黄连、明党参、细茎石斛、香果树等野生珍稀药用植物的陆续发现，更加增添了大盘山保护区的神

奇和深邃。

我大学毕业以后，回到家乡教书。当时的县城还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更没有一个像样的市场，有的只是零零散散几个小摊贩，农民种的玉米、番薯、药材当街晾晒，松明当灯，土豆当餐，日子过得比药还苦。作为全省五个特困县之一，有时出门连自己是磐安人都不好意思说。脱贫的路在哪里？磐安人发现，山中草，皆是宝，大盘山里没有一棵草是多余的，没有一棵草是敷衍的。于是，父老乡亲聚力建设中药材产业高地，从中药产业中找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良方。多年来，从山中一棵草到养生一味药，再到产业一座城，我亲身经历了磐安的华丽蜕变。

我们坐在“磐五味”中药加工技艺非遗传承人杨定升的“九和

堂”里，一边品着黄精石斛养生茶，一边闲聊磐安药市的变迁。回想起当年肩扛背驮、走南闯北贩卖中药材的艰辛历程，杨定升颇多感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辛辛苦苦种了药材，还要东奔西走去销售，一年到头赚不了几个钱。现在，各地客商进山交易，许多业务通过电子商务就可完成，鼠标点一点、微信发一发，生意就做成了，真是今非昔比啊。”

朋友顺手拿起一包延胡索，扫描二维码，查询结果显示，此包药材采自大山下村种植基地，户主是武丹仙。药镇里每一户商家都配有一个二维码，消费者通过扫描二维码，可全程追溯在售药材的来源和去向，真假优劣一目了然。一键直达，一屏掌控，握惯了锄头、犁耙的山区农民，学会并适应了用手机

管理基地，用电脑完成交易。“加个微信，今后需要什么随时可联系。”“好的，好的，这里到北京、武汉、青岛等地的快递，两天就能到。”短短一刻钟，彼此相谈甚欢，杨定升又多了几位来自各地的朋友。

如今，放眼江南药镇，店铺林立，商家云集，大健康产业研究院、产业园、康养产业园、康体养生园、中药药材园、中药主题公园等一批中主题项目陆续建成，磐安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磐安中药材被列为浙江省首批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示范建设项目。磐安当地七成农民从事与中药材相关的产业，早已过上了殷实的日子。

要离开药镇了，我向朋友挥手道别，内心更期盼着，江南药镇的药香能飘向辽阔的远方。